

知识分子论丛

Forum of Intellectuals

第1辑

许纪霖
主编

公共性与

公共知识分子



江苏
人民出版社

D01-53/1

知识分子论丛

Forum of Intellectuals

第1辑

许纪霖
主编

公共性与

公共知识分子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4387



江苏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知识分子论丛. 第1辑)

ISBN 7-214-03481-6

I. 公... II. 许... III. 知识分子—研究 IV. 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778 号

- 书 名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
- 主 编 许纪霖
- 责任编辑 余江涛 蒋卫国
-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 印 张 10.125 插页 2
- 字 数 235千字
- 版 次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481-6/G·1223
- 定 价 19.00元
-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拉塞尔·雅各比	回归公共生活 /1
陈 来	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 ——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 /8
许纪霖	从特殊走向普遍 ——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 /28
陆建德	知识分子与“地之灵” /68
冯克利	反知识分子的知识人 ——哈耶克的知识分子批判评析 /85
罗 岗	“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可能 ——知识与知识分子问题之再思 /111
于奇智	造反与理性 ——论萨特的知识分子政治实践观 /125
江宜桦	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 /171
章 清	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 /192
高力克	五四知识分子的公民观 /221
黄乐嫣	中国知识界:共同体追求中的分歧 /249
吴冠军	什么是“左翼”? ——知识分子的场域与实践 /282
	作者简介 /316
	编后记 /318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

成庆译 刘擎校

回归公共生活*

在1987年《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出版的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我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消逝的立论很快就变得可疑。当时的我既没能预见到学院派公共知识分子的迅即扩张对政治与文化生活的丰富影响;也无法想象出新的专业知识分子群体会从内部来颠覆既定的权威体制。未能预见这些情况是由于我执迷于陈旧的知识分子生活模式,过于看重那些有来历的白人长者。一些眼光犀利的评论者对我的这些过失予以责难。

假如这些告白只是外交辞令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不真诚的,与我本人的倾向相悖。《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绝非完美无缺,但在它出版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未使我更改该书的主要观点。本书曾经的暂定名——“最后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消逝”——已经充分展现了该书的主旨。我体察到一个代际更替过程:从本世纪初的公

* 本文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所著《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书2000年版序言,主标题为译者所拟,感谢作者同意我们翻译发表此文。——译注

共知识分子,到世纪末已演变为学院派的思想者。知识分子并未消失,但是其内涵却已有所改变。他们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超然于世,同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对通俗浅白语言的把握,而这种能力是从伽利略直到弗洛伊德以来思想家们所必备的。过去刘易斯·蒙福德(Lewis Mumfords)或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s)等人为公众所作的论题,他们的后继者则是在学术会议上对此大谈理论。

从受到的批评来看,这本书无疑触动了一根神经,那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分子的生活开始萎缩。但至少它使“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超出了文本局限而广为人熟知。最后的一个例子就是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宣称,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当时所扮演的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①的角色,并且他以此作为对康马杰评定的结语。而据我所知,“公共知识分子”这词应是由我首创的。

我在书中主要关注了左翼的思想家和作者们,但在最后一章则专门花费笔墨点明了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异类角色。他们忠实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激烈地批评专业化和学院化。他们怀疑官僚体制成功背后的代价,珍视那些常被专业人士放弃的明晰的写作,这也是他们在过去15年逐渐退潮的“文化大战”中保持低调的部分原因。我们很容易去列个谴责教育过失的保守主义清单(《偏狭的教育》,《终身的激进主义者》,《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但是答案又在何处?自由主义立场的教授虽然忿忿不平,但是却无法以清澈的语言来回应这些问题;他们只会收集大量的会议论文^②,付梓出

① Alan Brinkley, “The Public Professor”(见 Neil Jumonville 对 Henry Steele Commager 的评论),《新共和》,1999年9月27日, p. 42。

② 一个例子是 *The Politics of Liberal Education*, Darryl J. Gless 和 Barbara Herrnstein 主编 (Durham, N. C.: 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2)。

版的书缺乏任何的批评锋芒。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教育在很顺利地向前发展,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化,甚至有些激动人心。但很明显的事实是,那些固执的保守主义者总是无法洞察到这一切。^①这里无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悖反,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激进主义者这些对体制的激烈攻击者,却又成为这个体制的卫道者。

《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并且常常受到恶毒攻击。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这位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批评这本书是“粗心和狂妄自大,或许甚至是不负责任的”^②;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瑞布佛(Leo P. Ribuffo)教授则公开抨击本书是“油腔滑调、肤浅以及故弄玄虚的”^③。是什么让这些翩翩君子们如此紧张?我常常忽略了他们的同事、朋友甚至他们自己的那些出色著作。我曾说过我们新一代人已经“迷失”,他们缺乏早前的那些美国知识分子的必要素质和过人的风采。我强调的是,这一观点“并非是指个人品格或者什么天赋之类,也并不是指那些特殊的作家或者艺术家们”。我只是试图在更大范围里概括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变化。

沃尔特·肯德利克(Walter Kendrick)在《文学之声增刊》里的头篇文章中抱怨,“如今在美国,知识分子表现得十分活跃”。比如,“《文学之声增刊》(一份公共知识分子杂志)的存在就证明雅各比坚持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消逝的状况并非那般凄凉。”^④这本来

① 可参见 Lawrence Levine 的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以及本人在《异议》杂志上的评论,1997,冬季号, pp. 115—119)。

② Thomas Bender, *Intellect and Public Life* (Baltimore, Md.: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3), p. 172。

③ Leo P. Ribuffo, “评论: 最后的知识分子”, *Academe*, 5—6 月号, 1988, p. 83。

④ Walter P. Kendrick, “评论: 最后的知识分子”, 《文学之声增刊》9 月号, 1987, p. 13。

只不过是平常的回应,评论家们却以支持自己和他们的杂志、朋友的方式来反驳我的观点。舞蹈史学者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认为:“雅各比之所以没有发现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因为他找错了地方”。哪里才是正确的地方呢?是《电影人》、《行为艺术杂志》和《戏剧评论》这样的期刊吗?她的确发现了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其中一些和她如此的亲近,实际上一个就在她家中(她的丈夫,一个作品被广泛阅读的作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还有隔壁街区“《十月》杂志的编辑罗萨林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艺术批评家,甚至《纽约客》这样的杂志(或者其他一些地方)对他的起居室都有详细的描述”^①。这后一个更是让人同情,《纽约客》对他的起居室进行过报道就证明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怎么竟然对此忽视?

在对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表示轻蔑之外,我的批评者指责我“怀旧”,这对进步论者而言是重罪。对于许多评论家们来说,历史总是进步的,似乎20世纪的死亡集中营要比19世纪的监狱有所改进,另辟路径只会将自己打上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印记。这些评论家只会依据几个死板的范畴行事:不是为当代的知识分子奏警笛,就是在困境中哭悼过去。我在书中明确提出,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知识和文学上的巨人,例如我对利奥内尔·特里林和悉尼·胡克的严厉评价。并且我还勾画出不可逆转的社会趋势——都市波西米亚人的消亡和大学雇佣制度的膨胀——这使得独立知识分子成为了濒临灭绝的物种。即使如此,大量的评论家还在抱怨我仍然怀念利奥内尔·特里林。以上这些基本上是对《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的典型批评,有些人还认为该书是对20世

^① Lynn Garafola, “评论: 最后的知识分子”, 《新左翼评论》169(1988年5月号), pp. 125—126。

纪50年代炫目的文化生活的挽悼。

然而,如果说所有对我的批评都完全不得要领,或者说,1987年以来没有发生任何会使我修正自己论点的事情,那是不负责任的。一些评论家在如何鉴别知识分子代际以及如何定位公共知识分子方面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另有一些则对公共(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提出质疑;有些人建议将教育归类为一种政治活动形式。因为如今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教授,数以百万计的人身处学院,教育成为了一种公共的实践。关于这些问题,我在有限的篇幅中只对三个方面提出重新考量。

在原来序言的结尾中,我曾指出了即将到来的可能的变化。受学院里的不满和厌倦情绪的驱使,教授们重新开始进行公共写作。在过去十年里,这一现象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表现出来。在哲学领域,比如理查德·罗蒂代表了一种给公共哲学增添活力的努力方向,在其身后有很多的追随者。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们越来越多地尽力突破封闭的讨论范围而进入到公共空间中去。但是这些专业人士与其说是一味拒绝那种奖励深奥的体制训诫,还不如说他们开始注意对公众的贡献。但是他们能否成功?这一切尚未明了。

在过去十年里,所谓的黑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已经吸引了很多人的注目。第一次有这样一个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进入人们的眼帘——比如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杰拉尔德·厄尔利(Gerald Early)、小阿道尔夫·里德(Adolph Reed, Jr.)、兰德尔·肯尼迪(Randal Kennedy)和考耐尔·韦斯特(Cornel West)等人。这些人是非常聪明、不屈不挠并且文笔优美的作者,他们致力于种族、体育、政治法律以及文化等公共问题的讨论。他们既被人称为纽约知识分子的继承者,又被批评为哗众取宠者而忽视了早期的黑人知识分子传统,比如杜波依斯(WEB.

Dubois)和詹姆斯(CRL. James)。^① 在书中我尚无法预料到他们的出现,但认定仅凭他们的存在就足以驳倒我的观点就未免显得轻率。实际上,我将他们的成功看作是削弱了对《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的惯常指控,削弱了怀旧论批评的某种论调。我的一些批评认为,公众的阅读趣味无可救药的丧失也在腐蚀着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必然要屈从于与这个专业化时代更相适宜的专业化思想者。在我看来,新生黑人知识分子的出现表明,拥有阅读趣味并渴望阅读的公众仍然存在,而缺少的正是针对他们发言的愿望和能力。

除了这些以外,最近另外一个有希望的变化就是科学作者逐渐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性来,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写作了很多年。我并没有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提及他们,他们逐渐扩大的影响似乎证实了公众群体并未消失。然而科学家们常常被循规蹈矩的后现代理论家当作技术人员和实证主义者而轻视,这些科学作者们或多或少填补人文主义者留出来的空缺。我也一直在关心像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已故的卡尔·萨根(Carl Sagan)、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乔纳森·温纳(Jonathan Weiner)和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这样的人。^② 有一些专家们并不鄙弃就广为关注的

① 日益兴盛的文学的其中一部分包括: Robert S. Boynton, "The New Intellectuals," 《大西洋月刊》3月号, 1995, p. 53 seq; Michael Berube, "Public Academy," 《纽约客》, 1月9日, 1995, p. 73 seq; Sean Wilentz, "Race, Celebrity and the Intellectuals," 《异议》夏季号, 1995, p. 253 seq; Michael Hanchard, "Intellectual pursuit," *Nation*, 1月19日, 1996, p. 22 seq; "那不是你知道什么,那是你如何展示的问题: 黑人公共知识分子," pp. 47—76, Michael Eric Dyson, *Race Rules: Navigating the Color Line*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96); 以及 Ross Posnock, *Color and Culture: Black Writer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ntellectual* (Cambridge, Mass: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8)。

② 参见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Scientific Writing*, M. W. McRae 编 (Athens, Ga.: 佐治亚大学出版社, 1993)。

知识性话题进行清晰的写作，他们在文化公众中的成功引发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人文主义者失去清晰思考和写作的能力，而科学家们却表现得越来越敏锐、有效率和易于让人理解，那意味着什么呢？斯蒂芬·杰·古尔德说：“我对那种将通俗写作等同于流俗歪曲的论调深感痛心。”^①几乎没有哪个当代的人文主义者或者社会科学家会同意这一点，这又是什么原因？

《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与其说充满了哀悼的气氛，还不如说它在号召知识分子回归通俗表达，并且在公共生活里重新定位。一些评论家把这看作是一种背叛，一种反智主义的要求，这种要求试图放弃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来谋取媒体的上镜率。我并不认可这一点。没人万事皆能，知识分子的工作没有必要定位于一种模式。对于思想家和作家们而言，严肃和通俗易懂——并不一定总要同时满足——应该是可能做到的。毕竟，那些被誉为最具原创性和深度的思想家们时常关注广泛的公众。甚至以深奥著称的阿多尔诺都为他的广播演讲而费尽心力，以确保其清晰和易于理解。最终当知识分子在炫耀知识的深奥时，不仅让公众们迷惑了，同时也迷失了自己。他们的工作变得越发沉闷，不仅观点非常单薄，而且灵魂逐渐掏空。知性生活，就如生活本身一样，生命力来自对熟悉和安全感的诱惑的反省和抵制。

^① Stephen Jay Gould, *Bully for Brontosaurus: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1), p. 11.

陈 来

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

——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

当今世界,无论中外,“知识分子”的意义在大多数场合意味着“有专业知识的人”。而与这种通俗的、大众的用法相伴随的,是始终有一些思想家强调“知识分子”的非专业化的意义。早的不说,至少在拉塞尔·雅各比(Russel Jacoby)的《最后的知识分子》面世以后,“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已渐渐成了晚近美国公共论域的重要论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与其他的西方文化界的讨论往往与中国本土的兴奋点不相接近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则是一个很容易为中国当代文化论坛所引入的话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话语本身,在中国的后文革时代一直是知识阶层“认同的焦虑”的释放途径和探究方式,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表象。

在反右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体上处于“思想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总体不能作为革命的积极力量被肯定。或者是革命力量的边缘,或者是革命的对立面,在两者之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摇荡着,而且总是被推向后者。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和社会属性更被贬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差一点被归入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类的社会反动力量。知识分子的普遍压抑在文革之后遽然消解,并且在邓小平时代的初期以官方定义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身份恢复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地位,虽然这一提法看上去很反讽,但它确然是当时意识形态下所能给予知识分子的最大程度的重新肯定。我们都还记得,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每一次官方给予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都相当敏感。

如果说,1980年以前“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和动力总是围绕着官方的定位而发生,那么可以说,此后的“知识分子”话语则产生于知识分子自身在改革开放环境中的不断反思。这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自觉。30年来,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时代变迁的每一阶段的引人注目的文化图像。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身份”的解放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建设和专业工作的热情投身,而并没有立即引起知识分子自身对于“知识分子”的人文反思,这是不奇怪的。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起于“文化热”的前夜,这时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定义随着西方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

渐渐影响了知识分子自我认同,引起对“知识分子”的最早思考,并导致了“知识分子研究”成为“文化热”中的焦点论题之一。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反思一方面集中在做“改革的”还是“保守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强调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性、批判性,“自由知识分子”成了那一时期不少知识分子自我定义。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话语更多具有“政治化”的性格不同,90年代中期的“知识分子”话语是针对“市场化”,所谓“人文精神”的讨论因此而起。而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一方面,按其在西方发生的逻辑应当是针对“专业化”和技术理性,另一方面则可能也针对着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生活的“小资化”。这一切都明显地证实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深入历程。

其实,知识分子的名声不仅在中国曾经遭遇“臭老九”的尴尬,在西方也不总是运交华盖。萨伊德(Edward W. Said)甚至论定:“一直到20世纪,英文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知识主义(intellectualism)、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主要用于负面。”^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活动之外,同时把专业知识运用于公众活动之中,或者以其专业知识为背景参与公众活动。这些公众活动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运用和参与是以利用现代大众媒介等公共途径发表文字和言论为主要方式。无疑,公共知识分子观念的提出,是要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在以学术为志业的同时不忘致力于对于公共问题的思考和对解决公共问题的参与。

与以往知识分子概念的职业限制不同,如有些学者所强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其职业身份可以多种多样。如

① 萨伊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

果从“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杜维明语)的活动方面来看,那么公共知识分子所栖身和生存的地方,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地方。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栖存在学术界、政府界、企业界等不同领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甚至社会运动,虽然他们各自关心的公共问题并不相同,并且活动的公共方式亦各有异,但他们共同参与建构公共领域的空间,对公共事务发挥影响。

在这种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不可能把公共知识分子理解成观点一致的集团。公共知识分子们往往各有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文化主张,无论是改革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都是如此。知识分子可以是主张对现状批判的人,也可以是主张回到传统精神价值的人,知识分子无须与现有政治保持一致,但也不必与政治结构刻意保持距离。^①

不仅在同一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在不同文化—社会传统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往往各自突显出不同的特色。在文化中国最先倡导公共知识分子的杜维明指出,知识分子在沙俄集中体现为抗议的精神,但在美国则更多体现在增进市民社会的努力,在英国体现为社会批评,在法国体现为文化的反省,在中国体现为儒家性格的知识群体,等等。^②这使我们对于以下问题发生兴趣: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性的强调及其多样的公共性格在中国古代是否有其文化的资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传统对现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有何文化的塑造作用或影响?在描述的意义,上,我们能否比照俄英美法而把中国知识分子概括为在某一方面的突出体现?

① 参看《杜维明文集》五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页。

② 同上。

二

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一个属于现代性的问题。但知识者的公共性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也有其公共性。而中国古代的“士”“儒”“士大夫”,其本身在作为学者的同时就是官僚队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所以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士儒天然具有其公共性。虽然在承担行政职务的范围和等级上的不同会导致其公共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公共性对于古代的士儒从来不是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的展开和表达,无论就其存在和技术的意义而言,与古代已不可比,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发布政教,与今天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以大众媒介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大相径庭。古代士儒的政论文字,也限于知识人之间流传,而不是“公开的合理讨论”(哈贝马斯)。但是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现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群体传统的影响。

在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性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决不是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古典资源所给予我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理解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实上并不需要另外寻找特别的文献资料,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而言,现有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史的研

究,只要换一个理解的角度,大都可以变成知识分子公共性讨论相关的资源。

1987年,余英时在为其古代知识分子研究论集新写的自序中指出:

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的私利之上的。……

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孔子所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说得更为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所以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藩、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